

【发表论文】

近代女性游移经验与妇女 “解放”框架的再思考

秦 方（首都师范大学）

本文以二十世纪初中国女性在家外的游移（mobility）经验为切入点，试图分析贴合其上的女性“解放”思想。所谓游移，我指的是此时一些出身士绅阶层的女性，因参与女学、慈善或政治运动等原因，其身体、形象、言论得以在各类公共空间中来回流动。这种游移经验，一方面自有其物质性，即自 19 世纪后半期新式交通工具和现代大众媒体的兴起；另一方面亦折射出当时从幽闭到释放的话语转变。时人对女性的游移经验投射了一种乐观和美化的想象，游移成为女性解放的象征。但是，这种对游移的推崇，在历史层面和历史书写层面上，其实折射出时人和学者对现代性那种进步和解放特质不假思索的接受。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而是一个暗藏殖民主义话语霸权的历史性框架，因此，我们必须对附着在游移上面的妇女“解放”思想保持高度的警觉。

1905 年，为了鼓励女同胞们前往日本留学，秋瑾（1875-1907）曾写下这样一段充满浪漫情怀的话。“意自后我国姊妹苦经费之艰难，期间之短促，有志未逮者，咸得束轻便之行装，出幽密之闺房，乘快乐之汽船，吸自由之空气，络绎东渡，预备修业。”¹事实上，在 20 世纪初期，像秋瑾这样对家外世界充满乐观想象的女性并不在少数。很多来自士绅阶层的女性，因为追求学校教育或者参与国族政治等原因，频繁离家，跨越城市、省份乃至国界，成为一个在公私空间中流动的群体。以当时在公共空间中最为活跃的女教习和女学生为例。女学促使这些原本身居闺阁的女性离开家庭，或教书，或求学。就近而言，她们每日从家里步行走到学校，有时也乘坐人力车从学校到同城其他公共空间参加各种活动；就远而言，她们会借助蒸汽轮船或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长途跋涉地来到陌生的学校、城市甚至国家，担当起女教习和女学生的角色。

¹秋瑾：《〈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简章〉启事》，郭长海编：《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出版社，2003 年，第 368 页。

同时，游移不仅包括身体移动，还包括这些女性的言论、文字甚至是形象在社会中的传播和流通。以目前研究相对较少的晚清女学照片为例，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随着摄影术在城市中的流传和兴盛，很多女教习和女学生纷纷留影，并将自己的照片以互赠或出版的方式传播开去。照片的拍摄和流通可能不如身体移动如此频繁，但其流传之广度和影响并不亚于身体移动。而且，尽管照片没有文字这样自足的阐释体系，但它却能清晰有效地凸显拍照者的社会身份和定位。不仅拍照者使用的姿态、服装、饰件和背景等呈现出其身份，而且照片流传的途径亦能成为自我言说的有效方式。就此而言，不管是身体的移动，还是形象的传播，它们都是形成“重要能动性的场域”²。在其中，这些女性表现出她们对自己身体、行为、形象和社会关系的反思和掌控，最终形成新的性别规范和道德边界。

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来看，游移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丰富了晚清女性的家外经验，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此时从幽闭到释放的话语转变。在传统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宋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世俗化，中国女性多有意识地以幽、娴、贞、静为道德行为规范。当然，坚持内外之别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实际生活中真的足不出户。恰恰相反，根据明清史家的研究，至少在明清时期，很多士绅阶层的女性会出门走亲访友、踏青郊外、参拜寺庙、有时甚至寄居别家担任塾师或者跟随家人远途行旅、料理家事。³但是，当这些女性在外出时，她们一般会谨慎地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此作为个人道德和社会地位的表现和实践。这种对自我行为的规范以及对公共空间的警醒，一直延续到近代。如曾国藩之女曾纪芬（1852-1942）在其自订年谱中就曾回忆到，“余在督署虽仅髫龄，而随诸姊之后不出署门一步。”⁴此处颇有意味之处在于，它不仅反映出曾氏在青年时期实践内外之别的规范，而且在其 80 高龄修订年谱时仍有意识地强调自己当年对这一规范的坚持。

但是，这种尚“幽”的话语和实践却自 19 世纪后半期后开始遭到批判和否定。西方来华人士（主要以传教士为主）和中国精英阶层一起，自我赋权为女性解放者，并相应地建构了一个困于闺阁、沦为玩物的中国女性形象，对女性幽居家中、举止娴静进行否定性的批评。“幽”这一主动选择之美德逐渐成为“困”这一隐含被动和无助的恶俗。如林乐知的“幽闭”论则是一种典型论述。林乐知认为，中国女俗之坏有三大端，第二端便是“幽闭女人”。“中国尊贵女子，终身不出闺门，谓恐染门外之恶俗也。……不释放女人，即为教化不美之见端，永远幽闭女人，亦即为教化永远不长只见端也。”⁵与之对应地，林乐知提出“释放”一词，视其为“幽

²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x.

³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182-185;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15-142, 219-224;

⁴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引自李又宁编：《近代中华妇女自叙诗文选》，第一辑，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0 年，第 15 页。

⁵ 林乐知撰、任保罗述：《论中国变法之本务》，《万国公报》，1903 年第 169 期，第 7-8 页。

闭”之良药。“所谓释放女人者，何也？释放世人，因为第一要务，但释放女人一端，实为拯救东方诸国之良法，而中国为尤亟，因对症发药，非此不能奏效也。”⁶可以说，经过传教士和中国精英阶层的重新书写、阐释和宣扬，中国女性原本那种备受推崇的“深居闺阁”的生活方式及附载其上的道德意义，此时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成为中国女性之原罪，非改革不足以图存。

与这种被动地、无力地困于闺阁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时期所形成并被推崇的那种打破困顿的、外向的、活泼的新女性形象。中国女性或者说更大范围上的东方女性，被期待成为决绝地打破旧有秩序、腾空出世的行动主体，“相与抉网罗，破藩篱而出，如迅雷，如惊涛。其进步之速，诚可怖也。”⁷唯有打破困顿，女性才能进入一个充满自由的新世界。正是这种有关女性气质的话语转变，为晚清女性的身体、言语、形象甚至观点在实际和想象空间中的游移提供了合理性和合法性。

但是，我们要看到，尽管晚清关于游移话语的背后反映出时人对现代性那种进步、开放和文明特质的乐观想象和过度美化，但是，其在现实中的具化和实现是相当曲折的。当这些女性为国家故、为女学故、为独立故在城市空间和媒体空间中频繁往来时，游移固然扩大了这些女性的活动范围、改变了她们的身份认同，但是，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内外之别和良贱之别，这反而使得这些女性的文明形象受到挑战。其结果是，原本推崇游移的社会氛围反而矛盾地酝酿出这些女性对传统性别规范的坚持和强化，最终形成了一种“自由而不出道德范围”的杂糅性女性气质。⁸

如前面提及鼓励女同胞要快乐乘船前往日本的秋瑾，她没有对女同胞们说的是自己在行旅过程中其实需要随身携带一把倭刀的事实。据秋瑾好友吴芝瑛回忆，“后女士自东归，过沪上，述其留学艰苦状。既出其新得倭刀相示曰：‘吾以弱女子，只身走万里求学，往返者数，搭船只三等舱，与苦力等杂处，长途触暑，一病几不起，所赖以自卫者，惟此刀耳，故与吾形影不相离。’”⁹

⁶林乐知撰、任保罗述：《论中国变法之本务》，《万国公报》，1903年第169期，第7页。

⁷《东方女界之新现象》，《万国公报》，1906年第215期，第63-64页。

⁸纯夫：《女子教育》（其一），《中国女报》，1907年第2期，转引自张玉法、李永宁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台北：龙文出版社，1995年，第642页。

⁹吴芝瑛：《记秋女侠遗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秋瑾集》，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第190页。

再比如，妓女和新女性都拍摄照片，前者甚至还是摄影时尚的引领者。因此，为强调良贱之别，新女性在拍照时经常利用姿态、衣着、背景等细节，主动表达自己的文明和现代身份。不仅如此，大部分新女性的照片都刊登在以紧扣现代启蒙和开智为主旨的进步性期刊上（尤其以女性期刊为主）。¹⁰这些刊物的创办者多关注女性教育、两性平等、国族危机等时代议题。这些照片从来不会出现在那些以娱乐为取向的市井小报上。也就是说，尽管新女性和名妓因照相都处于公众的凝视之中，但杂志之分类或者说这些女性照片的流传途径却成为区分良贱之别的界限，新女性仍然得以在公众凝视中保存自己的文明性和进步性。

但是，我们必须警醒，这种对游移的推崇其实是充满权力关系的话语渗透后所形成的一种想象，它反映出时人对现代性那种进步、开放和发展特质的乐观想象和过度美化。此一倾向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即使是在最具批判性的女权主义学者当中，也未能引起足够的警觉。如 Elizabeth A. Pritchard 就曾经尖锐地指出，在西方性别史研究中，妇女史家无意识地将游移与西方后启蒙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话语挂钩，其结果是，这种所谓解放性的阐释框架有时反而成为真正损害女性权益的陷阱所在。¹¹

以上面提及的秋瑾为例。当这些新女性在进行公共宣传的时候，她们强调是美好的一面，但是在私下交往和现实生活中，她们却对新兴的交通工具和游移经验有一种戒备心理。这种戒备的来源在于，尽管以妇女解放为核心的现代话语鼓励女性走出家门，但是现代话语本身（如国族主义、女权主义等）在此时一直处于一个边界和意义持续形成甚至不断争议的过程中，它无法为游移的女性提供一套可以遵循、可以实践的规范。而行为规范对这些女性十分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实践，规范才能被内化为一种自然的心理认同和行为准则。¹²秋瑾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当她离开闺阁、乘坐汽船往来于中日之间，那种对游移的期待和对解放的向往并没有告诉她应该如何应对与同船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异性混杂一处的危险局面。最后，她反而采取了一种相当传统的自卫方式。

因此，当我们在为女性游移经验热烈欢呼时，我们必须按一下暂停键，认真对妇女“解放”这种惯性思维模式和历史评价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包括两个层面，妇女“解放”既是一种实际历史经验和存在，也是一种在学术层面和社会运动层面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思维模式。

¹⁰ 炼石：《发刊词》，《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 年第 1 期，第 3 页。

¹¹ Elizabeth A. Pritchard, “The Way Out West: Development and the Rhetoric of Mobility in Postmodern Feminist Theory,” *Hypatia* 15:3 (Summer 2000): 57.

¹² Tani E. Barlow, “Theorizing Woman: *Funü, Guojia, Jiating*,” in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eds., Angela Zito and Tani E. Barlo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261.

近代以来，很多社会思潮和观念从欧美和日本传入中国，如国家、民主、科学等。与这些观念和词汇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相比，我们似乎对于妇女“解放”背后所隐藏的殖民意识形态霸权警觉性最少。其结果是，妇女“解放”大约是近代中国妇女史最关键的词汇，也是很多学者用起来最为不言自明的词汇。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首先是女性在被动员过程中的工具性。在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管是民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政党组织，还是国家政权，他们多将妇女动员视为重要议题，认为妇女是他们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改造的重要力量，因此，对妇女解放思想进行大量的宣传，其结果是，在 20 世纪甚至 21 世纪，不管我们支持或者是反对妇女解放，它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思考妇女问题的基准线，成为一种日常和常规思想。其次，从妇女解放的结果来看，它确实促成了近代女性生活经验的极大改变，包括身体的改变、教育的获得、职业的发展、经济的独立、自主意识的形成等等。一时之间，经由“解放”，女性成为具有自主性和主体性的群体，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就。

但是，正如 Joan W. Scott 所言，我们以为女性获得了主体性便是解放的一种胜利，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主体性这一议题本身有可能是一个伪命题。¹³为什么我们会将主体性视为近代女性解放胜利的一个标签？这个问题背后是否暗示着我们认为传统的女性是缺少主体性的群体？这种缺少-拥有、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不正是我们在其他研究领域经常会经常反思的吗？为什么独独运用到妇女“解放”或者妇女史中，我们会如此乐观和美化地庆祝“解放”的胜利呢？因此，我们要摆脱那些不言自明的观念，对书写、阐释妇女史所使用的基本框架和概念进行历史性的反思，审视站在 21 世纪的我们是否仍然舒适地站在现代性这个舒适区（comfort zone）内、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些框架和概念。

我想来举一些例子，来看一些本应该具有历史性的议题和思维，如何在 21 世纪的今天，仍然被我们自然而然地接受来想象历史中和现实中女性的问题。

第一、一些经历会被视为“解放”，如放足、接受学校教育、走出家门、游移、生利、婚姻自由等；而另外一些经历，则会被视为解放的对立面“压迫”，如缠足、不识字、困于家中、分利、包办婚姻等。但是，我们很少反思，为何前者被挑出来，放入了“解放”的框架中，后者则被放入了与之相反的“压迫”框架中。这与自晚清起有关女性气质的界定体系（defining system）发生变化有直接关系。长久以来，士绅阶层女性将自己视为儒家性别规范的界定者、实践者和捍卫者。但是，时至晚清，她们却发现那些原本可以自足的身份标签都被一一否定：缠足成为野蛮的象征，家内生活被视为不事生产、只知分利之病根，为女、为妻、为母则被批评为只顾小家、无视国家，才女之角色更是因与国族危机不洽而饱受批评。据此，她们的精英地位受到直接

¹³ Joan W. Scott, “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 *Critical Inquiry*, 17:4 (Summer, 1991): 773-797.

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局面，她们只能利用自己的精英资源和阶层优势，依据放足、学校教育、公共道德、国家民族等新的现代标签，重新建立起“尊卑价值阶序”，¹⁴从而确保自己仍然站在这个新的等级社会的最上方。女性精英这种自我赋权的、认为自己理应引领女性变革的心态，与她们来自士绅阶层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和资源有着直接的关系。由是，以这些现代标签为准则，一种新的权力政治在传统社会分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些女性精英要在新兴的女性文化、性别机制和社会等级中保持优势和主导。

第二、女性地位说，即“一个国家妇女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象征”。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观念在社会中广泛流传，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宣称。但是，这个观点其实是在 19 世纪末期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扩张而传入中国的。像林乐知等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刊登此类文章时，便曾论及，“故论一国之教化，必观其女人之地位，以定其教化之等级，西方文明教化之国，其待女人皆平等，东方半教化之国，其待女人皆不平等，若在未教化人中，则其待女人，直与奴仆、牲畜无异矣。中华为东方有教化之大国，乃一观其看待女人之情形，即可明证其为何等教化之国矣。”¹⁵他们将地位与性别、国族联系起来，构成一种以国家为单位的等级观念，而这一观念与全球殖民秩序高度一致。如每每谈及妇女地位低的国家，林乐知等人多是列举印度、高丽、中国这样在殖民扩张中处于劣势的国家。此后，女权主义者或者国族主义者似乎没有任何异议地接受了女性地位作为国族的衡量标签，而并未对其背后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思。

第三、男女两性平等。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女性在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之间的摆荡，这制造了很多的历史问题，甚至一直到了今天，很多女性仍然在这两极之中摆荡。比如说，女人一方面要走出家门，和男性一样工作、赚钱、养家；但另一方面，女人又被期待承担家务劳动、养儿育女的家内责任。哪一个方面做得太好或者做得不好，都会受到批评和否定。现在的女性理想形象，则是那种能内能外的超级女性，她们既有令人艳羡的事业，又能完美地照顾家人，尤其是孩子。

两性平等问题，反映了自近代以来在妇女解放的框架中所出现的一种性别本质主义倾向。简单地说，在中国儒家阶序格局之中，像男女、乾坤、阴阳等都是关系性的，互补互生，男女既有同为“人”之平等地位，亦有“有别”之上下区分。¹⁶时至近代，儒家伦理规范中的关系性身份开始松动、受到挑战甚至被推翻，逐渐形成 John Fitzgerald 所谓的“类别性身份”(categorical identity)。以“女”这个类别为例，在此类别中，所有的女性都理应享有共同的性别特质，即使像秋瑾这样主动选择离开丈夫和子女、去日本留学的女性，也被视为“女界典范”。这种将女性作为一个类别以及将性别平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与现代国家的出现及将国民

¹⁴刘人鹏：《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台北：学生书局，2000 年，第 166-167 页。

¹⁵林乐知撰、任保罗述：《论中国变法之本务》，《万国公报》，1903 年第 169 期，第 7 页。

¹⁶刘人鹏：《近代中国女权论述》，第 1-72 页。

视为一种新的道德秩序类别有关，也与近代国家平等和种族平等成为理想秩序有关。¹⁷如晚清很多新女性自称“女界”，呼吁“男界”相助。再如“女界”与“商界”、“军界”、“学界”这样的词汇并列。但有意思的是，男界却只和女界形成对应关系，而从未出现和其他各界相提并论的情况。这意味着，诸如商界、兵界、工界、学界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由男性组成的“界”。

最后，我们要问的是，当妇女按照现代性的标准被解放后，她们为何不仅没有感受到那种美丽新世界的快乐，反而仍然反复、频繁地感到相似的困顿和痛苦呢？以往我们将这种家内家外的双重负担解释为女性解放的不够彻底，因此，中间所出现的各种挫折，从性质上来说说是保守的，从时间上来说说是暂时的，它们永远不会也不可能阻碍女性向前迈进的光明前途。但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解放”的彻底度呢？或者说，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到底是解放的不够彻底，还是解放这个框架从一开始便是有问题的？我们没有意识到或者深刻警醒这个框架本身所带有的权力话语和结构，而是直接接受了其呈现出来的现代性和合法性，将之拿来改造中国的社会和女性，最后，出现了一种新思想嵌合到中国社会中的不洽，而女性则为这种不洽付出了代价（其实男性亦如此）。因此，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意识到妇女“解放”这一思维模式的历史性，关切女性在被解放后面临的更为复杂的局面，并思考如何从国家、社会和制度层面去应对这样的复杂局面，以使女性能够真正进行选择——不管她们是选择走向“解放”，还是走向“压迫”——而不必背负政治压力、道德困境和生活重担。

¹⁷John Fitzgerald, “Equality, Modernity, and Gender i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Doris Croissant, Catherine Vance Yeh, and Joshua S. Mostow eds., *Performing ‘Nation’: Gender Politics in Literature, Theater, and the Visual Arts of China and Japan, 1880-1940*, Leiden; Boston: Brill, 2008, p. 24.